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与生态

Body and Ecology in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袁霜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与生态

袁霜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与生态 / 袁霜霜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1
ISBN 978-7-308-22016-3

Ⅰ. ①英… Ⅱ. ①袁… Ⅲ. ①浪漫主义－诗歌研究－
英国 Ⅳ.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43940号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与生态

袁霜霜 著

责任编辑 闻晓虹
责任校对 汪 潇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25千
版 印 次 2022年1月第1版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2016-3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身体的滥觞：济慈诗歌中的疾病特征 / 34

第一节 环境与浪漫躯体 / 35
第二节 疾病与诗语症候 / 40
第三节 疾病与身体诗论 / 49
本章小结 / 56

第二章 身体的辩护：雪莱诗歌中的素食主义 / 58

第一节 素食与身体意识 / 59
第二节 爱身体到爱生灵 / 67
第三节 生态乌托邦颂诗 / 76
本章小结 / 88

第三章 身体的狂欢：拜伦诗歌中的动物因素 / 90

第一节 诗人的动物关切 / 91
第二节 动物形象的呈现 / 99
第三节 被贬身体的抗争 / 108
本章小结 / 115

第四章　身体的回归：布莱克诗歌中的人体书写 / 117

第一节　肉身力量的正名 / 118
第二节　诗性想象与身体 / 125
第三节　环境的身体想象 / 134
本章小结 / 141

第五章　身体的栖居：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三重自然 / 143

第一节　诗人的神性自然 / 144
第二节　童心与身体反刍 / 153
第三节　地方与身体统一 / 164
本章小结 / 173

余　论 / 175

参考文献 / 187

附录一　“地方”与自我意识
——以乔纳森·贝特的“命名”理论解读《心灵的慰藉》 / 196

附录二　身体、疾病与诗：论肺结核与济慈诗学 / 206

后　记 / 221

绪 论

诗，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斑斓变化。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文化与自然的种种纠葛或矛盾也在此间突显且延续至今。英国浪漫主义产生于此特殊时期，诗人们虽未曾系统地提出过生态思想，但他们的确较早地意识到自然的价值而正面歌颂大自然，并对被机械主义和工具理性异化了的人性世界做出强烈的反叛。在此特殊时代，人类文明与自然的联系及矛盾直接交织于诗人躯体本身，也透过诗歌中的身体因素呈现。济慈、雪莱、拜伦，他们或身患疾病，或躯体残疾，却用“乖张”的身体诗篇演绎短暂的人生之曲。布莱克书写身体，发现了身体的力量，他以身体想象环境。华兹华斯隐居湖畔，寄情山川湖泊，移情花鸟虫鱼，他在哲思中用安宁的身体感受自然，用诗歌言说人类的栖居问题。

“身体”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承载着丰厚的内涵，并在各种历史语境下反复延宕演变。身体首先是一具躯体，是我们存于世界的根本。对于诗人而言，诗歌亦是身体的蔓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出隐秘而悠远的躯体声音，身体话语首先通过躯体传递。此外，身体作为思想界古老的中心论题，缘结了审美、政治、伦理等各种领域乃至本体论的思考。在身体的生态维度中，它是嵌于自然的一种物质，是处于生态世界中的机体。同时也因承载着弥合二元对立的文化内涵和话语力量，身体因素在我们认识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的关系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与科学的新天地，在注重理性的时代，身体似乎作为人类精神的对立面，在思想话语界受到极大的漠视与压制。而理性与科学的到来恰恰引领人们祛除迷信，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关注自身躯体的物质性。这实际上推动了身体意识的萌芽。环境剧变极大程度上激活了身体因素，尽管身体在思想话语界受到漠视与贬低，身体因素

却不可避免地活跃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当中。此时，身体意识处于萌芽阶段，浪漫主义诗人并未全面直接地宣扬身体。然而，向往大自然，酣畅宣泄自我情感，这种种表现却直接演绎了受理性至上与恶劣环境压抑的身体之反叛。因此，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编码对于研究该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诗学特点至关重要。若将身体话语加入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多重论题就能够得到拓展与深化。在多重身体视角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内涵与诗学价值也将更为全面地展现。

一、身体与生态批评

身体话题由来已久，不同时代在此话题上皆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同时，身体在客观上作为人存于世之根本，被不同研究领域纷纷纳入各自的研究视野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无论在医学、心理学、运动学，抑或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身体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兼具生物性和文化性是其公认的特征，这种特征与将重点致力于关注人类机体生存本身和物质环境关系的生态批评高度契合。身体与自然有着复杂的纠葛，对身体的思考流变与人和自然关系的变化一直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身体”在生态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生态批评无时不展现出身体维度。

（一）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身体流变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体是人存于世之根本实体，人自开始思考自身，“身体”概念便交织着矛盾性，身体如陈年美酿一样给自我以愉悦，又如一个甩不掉的幽灵一样给精神以烦恼。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身体观不断地被各种话语所构造。

“身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有二：“①指个体的人或动物生理组织的整体。有时专指躯干或整体中头以外的部分。②体格；体魄。”[①]事实上，“身”字是一个象形字，它在甲骨文中被描绘为腹部隆起的人体侧面形象，表示女子怀孕，隶化后的“身”字结构有所调整，“怀孕”的本义消失，指向躯体。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解释为“身，躯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凡身之属皆

① 参见阮智富、郭忠新编著：《现代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从身”[①]。“身体”本义中的“体”字在金文中为“體”，指身体里的器官，此后楷书又创造了会意字“体”，表示躯干。同时，“体”字在古今汉语中皆有体会、实践的意思。身体在英语中对应词是“body”，“body”一词用法较为丰富，与人体直接有关的名词性含义主要是人或动物（包括已经死亡）的躯体、（除头、四肢以外的）躯干。[②]此外，“body”作为动词时表示赋予抽象之物以形体。“body”的近义词“flesh”，表示肉体，肉体是身体的物质组成，“肉体”在使用中往往带有生理性欲望的指涉，而身体话语则包含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生理性的肉体只是它的一个维度。

综上可见，身体的中英词义首先突出的是其物质躯体性，即身体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有机实体。“头”是大脑所在，是思维的象征，而从“整体中头以外的部分”可见演变至今的身体词义明显带有与思维对立的偏向性。而“体”字所包含的“体会”等动词含义表明“身体”词义又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精神感受，“体”既是身体，又是感悟和实践，这与英文“body”作为动词时更加强调外在形体的呈现是不同的。“body”词义与汉语“身体”的此般区别，与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对身体所进行的身心二元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过程，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身体与灵魂两者展开了辩证讨论。苏格拉底认为身体与灵魂是相对的存在，并把身体视为人追寻智慧之路上的障碍，他强调灵魂不朽且能摆脱身体，哲学家应该用灵魂、用心灵去探求真相。在他看来，灵魂带有知识，而灵魂一旦进入身体，即出生，我们便遗忘，知识的再次获得即回忆。身体在他这里便是低下的肉体，一直在扰乱着灵魂，身体是哲学家应该学习摆脱的凡俗之物，他直接言说着对现世肉身的不以为意：“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③]身体是灵魂达到澄明的障碍，他直言“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搀和一起，我们的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④]，“我们得承认，

① 许慎：《说文解字全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② 参见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编委会：《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③ 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④ 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和肉体同类的东西是烦人的、沉重的、尘俗的，也看得见的”[①]。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世界比作一个永恒的生命体，神将灵魂安置在这个生命体的中心，并使它统摄整个身体，把身体包围起来。为了突出灵魂绝对至上，柏拉图还强调，“神在造身体时，已经把灵魂造好了，这样做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即当灵魂和身体合在一块时，后生统治先生”[②]。亚里士多德也在《政治论》中提到：“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统治的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的部分。”[③]西方文化传统中贬低身体，视身体为灵魂或心灵的对立面并受其统治的思想源头即为此。

古希腊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期，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人之生活并未像今日般常常在现代文明中穿梭，习惯性用机器和数据解读任何现象，甚至遗忘亲近自然，因而彼时出现思想家思考灵魂或心灵与身体关系的现象，乃是人类的思维正从思考自身身体出发，继而萌发形而上学的象征，是思维进步的体现。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有着七情六欲，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常常以人的裸体形象为塑造对象。这实则意味着，彼时的人类能够坦然面对身体，较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的动物性。他们依赖生态世界，并与之相融，他们也用身体构想自然或世界，古希腊思想家将灵魂的存在套用在自然观中，把世界“当成被‘赋予了灵魂的’某种东西”[④]，如泰勒斯。然而，对于灵魂抽象提取，进而推崇提升，将身体贬为充满各种劣根性的肉体概念，古希腊思想家的这种意识经过基督教的接收和反复强化，深深地扎根在了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基督教的不断深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极致。

此外，身体与灵魂的对立作为一个基本思想范式，也被引申到动物与人，女性与男性等二元图式的建立中，亚里士多德直言道：“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关系。驯养动物比野生动物性情更为善良，而所有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驯良。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

① 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②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页。

④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的差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①]由此可见，在这种思维传统中，越是接近身体性、接近自然状态的事物，越是受到贬低。灵魂或心灵、精神或理性，这些都逐渐成了全能上帝的象征。

到了十七世纪，笛卡尔的学说延续了将拥有思维和灵魂视为人与动物的区别的传统，认为剥离了灵魂的身体与动物等同，且在他看来，可以把身体与动物视为机器。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中提出：“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脸、手、胳臂，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这架机器，我曾称之为身体”[②]，“如果我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也并不妨碍它以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③]。这种学说逐渐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接受，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按照类似的思路创作了《人是机器》一书，表现了渗透于知识界的机械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被神权压抑的漫长的中世纪走向尽头，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随之涌现的是大量的机械奇迹，各种自动化机械装置不断在人们生活中呈现，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接受机械化的身体观。在这种理念下，人对待身体的态度不仅仅是贬低或压制那么简单，而是开始对此表现出一种已彻底揭开其面纱后的不以为意。汪民安指出：“意识战胜身体的方式从笛卡尔那里发生了变化，笛卡尔同样将意识和身体划分开来，但是从那里开始，身体不是被刻意地遭到压制，而是逐渐地在一种巨大的漠视中销声匿迹了。”[④]笛卡尔认为天赋理性，“我思故我在”，理性是独立于身体的存在，而身体只是机器。于是，身体成了彻底的客体，它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受到物理定律的支配，也可以用科学去解剖和探索其全部秘密。自十七世纪以后的一个多世纪，身体与自然一同开始了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旅途。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开始膨胀。身体开始在社会人文思想中缺席了，成为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身体在社会人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页。

②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③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89页。

④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第39页。

文领域话语权的消失，也意味着自然之物话语权的消失，人文学科通常将心灵或精神作为主题，并且认为文艺是高于身体和自然的，黑格尔就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只因它是由心灵产生的。

身体在笛卡尔二元对立的思想下开始销声匿迹，然而这种机械主义的观念也推动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生物科学自十八世纪以来不断发展，作为心灵与物质统一体的“生命”概念被突出强调，生物学研究再次反过来打破了其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在《论人》和《灵魂的激情》中认为松果腺位于人类大脑中，是灵魂所在，或者说它沟通了灵魂与身体，使二者能相互作用。“松果腺”理论在今日的生物学或医学看来显然无法成立。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作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曾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从生理学等角度打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而从另一角度看，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在身体的被湮没中走向了顶峰，到处宣称人的伟大是因为他是理性或精神的载体。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家们把唯心主义运动推向了极致，在此等形而上学中，身体几乎没有话语权。然而身心统一体的事实无可厚非，吊诡的是，理性运动也将推动人不断地探索认识自己，人们终将回归，重新认识身体。更何况对于非理性的过度遮蔽和压抑，终将导致其爆发，正如一味地忽视自然终将遭到自然的报复。这一切的结果是，身体从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发声。

容易被忽视的是，浪漫主义的诗学文本当中已开始大量流露诗人的身体意识或身体因素。环境的剧变加深了身体对自然的渴求与感知，诗人的身体感受突显，理性运动推动下的医学、解剖学等生命科学的发展，使他们初步产生身体意识。以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为例，它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宣言，华兹华斯在其中定义了浪漫主义式的“诗人”，其中夹杂着身体意识。他将诗人与解剖学家做类比，认为诗人以他本身的敏感产生和表达情感，给人愉悦。华兹华斯在强调感受力、内在创造力时，无疑描绘了一个具身性诗人，“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锐敏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①]，不仅如此，“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这种热情与

①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现实事件所激起的很不一样”[①]，“并且又比别人更有能力把他内心那样地产生的这些思想和情感表现出来……无疑地，它们与我们伦理上的情操、生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相联系”[②]。同样，他也将诗歌视为有血有肉的存在：“希望读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③]，“诗的眼泪，‘并不是天使的眼泪’，而是人们自然的眼泪；诗并不拥有天上的流动于诸神血管中的灵液，足以使自己的生命汁液与散文的判然不同；人们的同样的血液在两者的血管里循环着”[④]。在此，他强调诗歌并非产生于外在的神性召唤，而是物质性生命的产物。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普遍强调感受力与想象力，诗人作为这类能力的体现者，肩负着掌控想象的使命，华兹华斯设定了诗人重返自身的途径。情感产生于有血有肉的物质身体，对于内在情感的关注实际上是重返身体的体现。作为诗人或作家，浪漫主义者并未能如哲学家般理性地捕捉与阐明身体意识的到来，他们更多进行着诗性创作，于是，心灵、想象等标签成为浪漫主义诗歌中身体的外衣，传统批评话语往往忽略其内在身体性。事实上，这种强调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潮引领着身体的崛起。

到了十九世纪，尼采称上帝已死，发出“从身体出发”的口号。他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背后有着一股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即权力意志，于是他直呼：“人类，已经成了自然力的主宰，他的野性和放纵的主宰：欲望已经学会了服从，学会了功利。与一个猿人相比较，人类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权力。”[⑤]尼采强调了人性中无法撇去的动物性一面，它是非理性的，来自身体，人的身体不应该受到轻视。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直言：“我全是肉体，其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指肉体方面的某物而言罢了”，“我的兄弟，你称之为精神的你的小的理性也是你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的理性的小工具和玩具”，“创造的肉体为自

①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②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8页。

③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9页。

④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2页。

⑤ 尼采：《权力意志：1885—1889年遗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27页。

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其意志的帮手”。[①]形而上学长期以来将身体视为与动物等同，在这样的传统看来，这两者皆是次等的，人依靠理性而为人，尼采则为身体发声。虽然他并未正面建立身体哲学，但从身体的角度看，无疑在他的哲学视角中，权力意志源自对身体性的思考，它无疑是身体的一股超越性的力量。如此一来，尼采也不再强调人是高于动物的理性存在，而认为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②]。

此外，尼采又形象地将阿波罗精神（日神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视为艺术的起源，酒神精神正是忘我的、狂欢的，表征着合一的力量，它更象征着身体性和自然力，身体性内在于人的自然，即生命力和本能的层面：

> 自然的本质就要得到象征的表达；必需有一个全新的象征世界，首先是整个身体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嘴、脸、话的象征意义，而是丰满的让所有肢体有节奏地运动的舞姿……为了把握这种对全部象征力量的总释放，人必须已经达到了那种忘我境界的高度，这种忘我境界想要通过那些力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③]

尼采形象地分析了酒神颂歌，它是身体的狂欢，是生命力的释放，悲剧精神正是通过回归身体、释放生命力的方式来达到生命的弥合感，故而他说：“此即狄奥尼索斯悲剧的下一个效应，即国家和社会，一般而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鸿沟隔阂，都让位给一种极强大的、回归自然心脏的统一感了。”[④]尼采的理论明显包含着身体的大地性，人在这种狂欢式的艺术形式中达到自然的状态，这种自然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于是，身体也成就了艺术的感染力，因为人即身体。

至此，身体从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去推翻“理念”“我思”“理性”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身体不再被视为广延的物体，而是生命体的核心，

---

①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0、31页。

②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页。

③ 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页。

④ 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8页。

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它逐渐成为哲学等人文学科关注的重大焦点之一。巴赫金所讨论的狂欢节是身体的狂欢，弗洛伊德大胆强调身体的本能和欲望，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更是系统地建立了身体现象学。

如果说尼采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发现了精神中的非理性、动物性，使身体在人文研究领域发声，那么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家们则进一步揭开了身体隐秘的文化内涵，彻底提出消除身心二元论。梅洛-庞蒂运用大量心理学、生理学等极为细致的科学分析，聚焦身体，来建立他的现象学体系，试图解构存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他看到了身体与世界的实在联系，指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①]。身体不是纯粹独立的物体，它拥有统一性，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是身体性的，是一种知觉，身体赋予物体和抽象概念以意义，我们获得认识和理性皆离不开身体知觉。梅洛-庞蒂透过身体，也对自然世界有着独特的认识，他将人与外在自然世界的关系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由于物体之间或物体的外观之间的关系始终需要通过我们的身体，所以整个自然界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处在对话中的我们的对话者的表演。”[②]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他得出：

> 自然世界是所有界域中的界域，所有风格中的风格，它保证我的体验在我的个人历史生活的所有断裂中有一种给出的和非规定的统一性，它的关联物就是我们从中发现身体定义的我的感觉功能的给出的、一般的和前个人的存在。[③]

这段话启示着我们，人们的逻辑活动都建立在对世界的体验上，自在和自为无法分割，身体联结了自然世界中的万物，自然界亦是保证身体定义感觉与存在意义的场域。身体在环境中的嵌入，也使得现象学家对于“地方”（place）倍加关注，如海德格尔提出“栖居”，而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地方”的研究又深

①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6页。
②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5页。
③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8页。

受身体现象学的影响，如段义孚对空间与地方的探讨。

自由烂漫的古希腊人从身体出发，思考生命和自然万物，开始认识人类自己，认识人之精神和思维的高贵，而到笛卡尔时代，人类中心主义膨胀，身心二元论思想全面铺开，在极度的理性崇拜下将身体与自然一同祛魅。十九世纪，尼采却面向大地，为身体发声，正面看待人身上非理性的自然力。二十世纪的梅洛-庞蒂更是将躯体性层面的身体与现象学研究结合，试图打破人文学科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由此历史轨迹可见，身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它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回归，人是身体并居于世界，人们对于身体和自然的认识也始终纠葛在一起。

（二）生态批评中的三重身体维度

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认知科学、心理学、现象学的深入发展，围绕“身体”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福柯将政治权力的运转与规训身体联系起来，建立了身体政治学，波伏娃、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又从身体视角出发，构建各自的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批评自诞生至今，虽未显明而普遍地强调身体研究的重要性，但其发展深受包括身体理论在内的众多理论的影响，并在其自身的理论探索和构建上与“身体”话题紧密相关，呈现出“身体”维度。对此，笔者认为生态批评与身体的勾连主要体现在弥合二元对立、物质转向以及关于“地方”的思考当中。

首先，弥合二元对立是生态批评中身体维度的一个原则性体现，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皆对此做了重要探索。

身体研究对生态批评的影响，较大程度上来自女性主义。波伏娃在《第二性》开篇从生理学的角度，即从女性与男性身体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角度展开研究，她主张采用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围绕“为何女人被界定为他者”的问题展开探讨。波伏娃认为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世界中的他者，女性被视为自然的同类，是土地，是水，具有被动的繁殖能力。在波伏娃看来，男性对女性的态度正如人对待自然一样是矛盾的，一方面人开垦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产生和死于自然，自然对于人而言有着不可被压倒的神秘性，而男性期待在女性身上把握自然，其实是用自己的意志塑造臣服于自己的女性。她提到，“首饰的作用是

同时让她更密切地属于自然和使她摆脱自然，这是将认为的凝固的必要性赋予活生生的生命。女人使自己变成植物、豹子、钻石、珍珠，将花朵、皮裘、宝石、贝壳、羽毛和她的身体混合起来……在打扮过的女人身上，自然虽然在场，但是也被一种人的一员俘虏了，按照男人的欲望被重新塑造了”[①]。波伏娃对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中女性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有着细致的分析，这对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她研究对象中的身体概念很大程度上还是与社会意识相分离的，因此以上对身体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建立在身体与思维二分的基础上。

当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巴特勒延续了性别的社会构建论这一女性主义重要命题，并以身体为据点，对波伏娃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身体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是其在《身体之重》中重点谈论的概念，这里的“物质化”概念强调了被规训、塑造的被动性，换言之，身体在传统二元对立思想下被强化为本体意义上的被动性存在，即物质，权力关系不断地促成其物质化的形成。然而巴特勒笔下的身体是开放性和生成性的，它“从没有对强迫其物质化的规范完全顺从”[②]，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成为可能，即身体对不断压制的权力规范会发生反叛，两者是相互生成的。在她看来，被视为他者的女性、同性恋者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身体对规范主体的反叛。此外，巴特勒曾提到，“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自然的概念需要重新被思考，因为自然概念有它的历史，将自然视为空白和无生命的纸张必然是出现于现代，可能与统治性的科技出现有关。事实上，有人认为将自然视为动态的相互关系同时适用于女性主义和生态目标”[③]。由此可见，巴特勒虽然强调权力对性别、身体、自然的构建作用，但在她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一边倒地强调某种构建论，而是凸显身体本身的超越性，试图突破以身心为主导的各种二元关系，挖掘两者之间无法分割且动态的关联。巴特勒对身体物质性的重申为后现代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深深影响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

以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为代表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

① 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②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2.

③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4.

态女性主义学者延续了后现代关注物质性的研究，更将视野跳出现象学的形而上和语言学的话语构建，将身体的真实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纳入研究范畴，并切身加入绿色运动的实际行动中。他们进一步发现了二元对立思想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分裂，发现现代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人类行为对真实身体造成躯体性的影响，以此对现代性做了深入的批评。斯普瑞特奈克指出："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①]生存的物理性，包括身体、自然和地方的统一。她认为身体是包含心灵的，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身心"（bodymind）。身体自身拥有自愈能力，并且与环绕着的自然相协调，由此她批评了现代医学中绝对偏向生命机械论的治疗模式，肯定中草药、针灸、瑜伽、太极等主张尊重身体整体性的调理模式。而身心二元分离使"心灵一方面失去了其理性和灵性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感觉和情感的'腐蚀'作用。这种二元论的栖身之地是某种更大的二元对立：即人与自然的分离"[②]。斯普瑞特奈克强烈批判了身心二元论，认为它强行造成现代人与自然断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和身体自身的灾难。解构主义所主张的语言构建决定论在她看来亦是分割了身体对世界的实际感知。总而言之，斯普瑞特奈克强调了与环境紧密相连的身体的物质真实，以及它自身的整体调节能力，她对现代社会断裂身心、破坏环境的现象做了强烈的批评。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广泛涉及以身体为焦点，将身体、女性、自然三者相联系的研究，并推动身体研究朝向"物质化"方向转移，女性主义对生态批评在身体维度上实现了重大影响。生态批评关注人类真实生存状况，身体必然成其焦点。身体、女性、自然在二元世界中被归为同类，三者因拥有二元世界的同类性而获得生态批评对于其互联性的格外关注，消解二元文化对此三者的压制、贬低、侵犯是生态批评的话语前提，质言之，弥合二元对立是生态批评中

① 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② 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9页。